

孤独的英雄 ——纪念林则徐的外国战友金先生

160 余年前，各国商人在中国销售鸦片，一位名叫金的外国商人，因拒绝销售鸦片而被人疯狂嘲笑，今天在中国，法律和道德仍经常遭到贪婪和无知的挑战

文/艾德（Michael Aldrich）

艾德（Michael Aldrich），路伟国际律师事务所北京合伙人，在公司法和商业法领域经验丰富，同时是电信领域的专家。大学学习历史，后获法学博士学位，著有《消逝的北京》一书

有别于广泛的社会责任问题，合规管理常常被视为企业一种良好的经营方法。赞成这种观点者，无需借助职业道德论证，便可列出充分的理由。这让我们联想起中国古代韩非子和他的法家。

韩非子们所倡导的治世原则是一种纯粹的功利主义观点。我不反对这种观点，但我认为它忽视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即我们希望倡导的是哪一种行为。为了更好地支持我的观点，在这里，我想向大家介绍一个人——金（William King）先生，他来自于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阿利芬特（Olyphant）公司。

大约在 1830 年左右，即所谓公行制度存在的最后几年（公行是当时清政府为限制外国商业，于 1720 年在广州设立的对外商进行贸易的组织，后根据《中英南京条约》被取消），金先生居住在广州。一谈起公行制度，我们通常会立刻想到鸦片贸易。这是当年的英国人用来解决对己不利的对华贸易逆差而采取的措施。

大家可能都知道，由于 1790 年前后，英国人对中国茶叶的需求极大，但却找不出任何英国本土生产的物品与之互换。而当时贸易都以白银进行，这样，英国国库白花花的银两如流水般流入中国。为了改变这种势头，英国人想出了销售鸦片的主意。

当时在印度靠近喜马拉雅山一带，英国东印度公司占有大片领土，种植了大面积鸦片。关于英国这一策略所产生的后果，我们都很熟悉了。贸易逆差得到扭转，鸦片销售在 1800 年翻了数倍，制造了数百万鸦片瘾君子，民众受苦，社会矛盾激化。

在阅读这段中国历史时，人们常会有这样一个印象，即只有欧洲人和美国人在从事鸦片贸易。这实际上是误解。鸦片贸易的丰厚利润吸引了世界各国的商人。在广州，孟加拉商人、旁遮普人、孟买商人、阿拉伯商人、泰国商人、犹太商人和来自新加坡的南洋商人都在与英国东印度公司进行竞争，牟取暴利。同样的，来自瑞典、法国、丹麦和德国的公司都在广州建立货栈，以便利这一贸易的进行。查尔斯，一名操着粗重德国口音的波美拉尼亚传教士，正是 19 世纪西方伪善家的典型代表。他一边与鸦片运输船队船长合作，在中国海岸寻找非法销售鸦片的新港口，同时也在分发中文译本圣经，试图劝服人们皈依基督教。

还有一点经常被人们忽视，在广州出售的鸦片必须在中国基督教会里发售。当时，外国人在一年中只有 6 个月能在广州的外国人区活动（另外六个月则在澳门），因此他们将鸦片卖给中国商人后便置身事外，由这些中国商人在国内进行销售。这不是一项小工程。它需要中国官员、商人、船东和船长、手推车车夫、以及批发商和零售商的配合。这些人也被这个行业的丰厚利润所吸引。

就连紫禁城内的皇室也没能抵挡住鸦片贸易的暴利诱惑。嘉庆和道光皇帝将两广总督的头衔出售给出价最高的人，大家十分清楚，总督必定要从鸦片贸易中挽回他的损失。

后来，有些西方人开始站出来反对参与这种贸易。但是，主流观点，尤其是那些希望脱离公行制度、实现自由贸易的英国利益代言人，他们争辩说，如果放弃鸦片贸易的收入，英属印度殖民地将难以管理。于是，在广州和其他地方发行的英文报纸杂志出现了许多自以为是的狡猾说辞，论证商贸是平等国家之间的正常关系状态，鸦片贸易的负面影响完全因中国市场参与者的品性弱点造成。它们对自己的论点是如此坚信不疑，就像今天华尔街日报在倡导全球化一样。

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常常会看到现实实践与法律原则的分歧。清政府出台的法律明确地规定从事鸦片进口和销售是非法的。但是，外国和中国商人的行为以及地方官员的公开合作却是对法律尖锐的嘲弄。在少有的打击鸦片贸易的时候，在珠江口岸伶仃洋一带，这种毒品的卸载和销售贸易依然照常进行。

一些贸易公司（主要是来自新英格兰、东海岸各州和弗吉尼亚）一开始拒绝加入鸦片贸易。他们的观点的前提是销售合法产品已能产生足够良好的收益。但是，原则就因鸦片交易额及其投资的高回报率被冲淡，遵守清朝法律的主张也因此被弱化。正如中国鸦片商人反复解释的那样，外国人不必太担心皇帝颁布的法令，每个人都在用这种方式聚敛财富，根本上来说完全没有问题。160年后的今天，我还会听到一些自鸣得意的企业家发表相同的言论，这总能让让我唏嘘不已。

在当时，只有一个例外。马萨诸塞州波士顿阿利芬特公司对这些伪善言论嗤之以鼻。因为它们损害了中国。金先生时任公司广州代表处的总经理。他断然拒绝从事违背中国法律和公平原则的交易。这使他成为广州外国人社群中的笑柄。“他不想赚钱，”他们都在背后这样嘲笑议论。公行的商人们早已习惯了外国人各种各样的怪癖行径，但对他们而言，金先生是愚蠢。

这个孤独的英雄后来自然在钦差大臣林则徐禁烟之战时成为他的朋友。1839年，林则徐带着道光皇帝永远消除鸦片贸易的上谕指示来到广州，没收了成千上万箱鸦片，并安排将它们销毁。鸦片贩子没有得到一分补偿，损失惨重。

当时林则徐面前有许多选择。他想将鸦片送往北京，证明这些毒品已被没收，但却担心有一些大胆妄为的人会在鸦片运输途中携鸦片潜逃。烧毁鸦片留下的残余同样可以被瘾君子吸食。最后林则徐想出一个主意，将鸦片与石灰和海水混合，然后冲入珠江。

林则徐邀请金先生来见证这场销烟壮举。在整个过程中，二人通过一名官方翻译进行亲切交谈。此后，金先生和林则徐共赴宴席，金先生受邀坐在主人左席。这一景象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金先生可以自豪地说，他是当时为数不多的没有伤害中国的外国人，并且得到了当时的著名钦差大臣林则徐的认可。从中国历史来看，这可以说是一个无尚的荣耀。遗憾的是，林则徐和金先生的观点并没有得到当局的认同。法律和道德的这一刻短暂胜利很快就遭到来自贪婪和无知的挑战。

今天，林则徐的英雄行为广受赞誉。而金的事迹却不为多少人所知。我一直试图查找在这次宴会后关于他的消息，却始终无果。但是我总是深切地怀念着他。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想起自己作为一个外国人曾经受到林则徐的如此尊重，一定会感到无比自豪吧。每当想到这一点，我就不禁羡慕他。

在今天这个时代，当中国再次呼唤市场原则和守法行为的回归时，我想，林则徐和金先生应当是我们的典范。

版权所有 © SGLA 2008。

此出版物仅供阁下参考和兴趣阅读之用，无意作为完整全面的信息，并不构成亦不应予以依赖为法律意见。请根据自身情况寻求专门咨询。